

中国当代小说的

叙事伦理

问题

ZHONGGUO DANGDAI XIAOSHUO DE
XUSHI LUNLI WENTI

祝亚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0sk451zd)

中国当代小说的 叙事伦理问题

祝亚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祝亚峰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50-2324-8

I. ①中… II. ①祝…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748 号

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

祝亚峰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印张	13.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数	222 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安徽昶颢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324-8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部分 叙事伦理与批评方法	(010)
一、叙事伦理：小说叙事研究的现代形态	(011)
(一) 理性句法：文艺批评语法基础溯源	(011)
(二) 审美句法：文学阐释元素的变相	(015)
(三) 伦理句法：文学阐释元素的融合	(018)
(四) 叙事伦理的“现代形态”问题	(022)
二、叙事伦理：从政治伦理、精英伦理到个体伦理	(026)
(一) 政治/精英：同质异构伦理规约下的文学叙事	(026)
(二) 个体伦理：对精英伦理的置换及文学叙事的转化	(030)
(三) 叙事伦理：当代小说的伦理意涵及话语方式	(033)
三、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	(036)
(一) 叙事/价值：搭建起文本批评的基础平台	(036)
(二) 伦理/叙事：伦理原则经叙事批评而建构	(040)
(三) 叙事/伦理：由形式分析而发掘伦理的意义	(045)
四、叙事伦理批评的伦理原则问题	(048)
(一) 叙事伦理批评的“伦理原则”	(048)
(二) 叙事伦理批评的“伦理底线”	(050)
(三) 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批评问题	(053)

第二部分 创伤历史与叙事伦理向度	(061)
一、《南京安魂曲》与创伤历史	(062)
(一) “南京大屠杀”与创伤叙述	(062)
(二) “创伤记忆”与叙述者“证言”	(066)
(三) “创伤记忆”: 审美、伦理与认知	(071)
二、《后悔录》与个体创伤叙事	(075)
(一) 《后悔录》的视角与叙述	(075)
(二) 个体创伤与叙事伦理	(079)
三、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	(083)
(一) 历史叙事的轻逸与沉重	(083)
(二) 历史叙事的“虚”与“实”	(084)
(三) 轻逸: 对抗沉重的一种历史叙事	(088)
四、历史与伦理: 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091)
(一) 从历史回归伦理修辞	(091)
(二) 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	(094)
(三) 叙事伦理: 历史与伦理的纬度	(099)
第三部分 个人、边缘情境与伦理叙事	(103)
一、《推拿》: 身体、意识及伦理叙事	(104)
(一) 盲人“身体”: 实存的困境与抗争的凭借	(104)
(二) 盲人“意识”: 身体与意识分离重叠的图景	(109)
(三) 盲人“世界”: 《推拿》的叙事话语与伦理取向	(114)
二、《余震》: 灾难、个人及伦理主题	(121)
(一) 生存伦理与灾难故事	(121)
(二) 个人视阈与灾难叙述	(126)
(三) 不可靠叙述对伦理主题的干预	(130)
三、《米尼》: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	(132)
(一) 米尼故事的生活版本	(133)

(二) 米尼故事的人性版本	(136)
(三) 《米尼》: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	(140)
四、《太阳黑子》: “罪”与“罚”的思考	(143)
(一) 叙述线索与人性面相	(144)
(二) 叙述视点与伦理判断	(148)
第四部分 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研究	(155)
一、70后女作家的命名与成长	(156)
(一) 新世纪之前的被命名	(158)
(二) 新世纪之后的自觉	(161)
二、70后女作家新世纪后的叙事	(164)
(一) 叙事客体与“他者”形象	(164)
(二) 叙事主体与叙述的多元化	(183)
(三) 叙事形态与“有意味的文本形式”	(194)
三、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200)
(一) 重建女性文学的价值标准	(201)
(二) 重展“飞翔”的叙事姿态	(205)
参考文献	(208)
漫想漫谈	(211)

导 论

叙事伦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于汉语批评界，至今已成为常态的文学批评术语。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新概念，叙事伦理是回应文学艺术伦理的叙事表达，将叙事分析与价值判断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同时，这一概念还用来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形态丰富的伦理叙事现象。

一、“叙事伦理”研究现状的描述

在“读秀学术搜索”中输入“叙事伦理”关键词，中文文献检索出 1990—1999 年文章 4 篇、2000—2009 年度期刊文章 223 篇、2010—2014 年度论文期刊 360 篇、专论专著 4 部。分析结果如下：①至 2000 年以后，叙事伦理一词被频繁地用于小说文本叙事批评，此后，评论界也逐渐地重视对叙事伦理概念生成溯源、内涵意蕴方面的研究。叙事伦理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热门的话题。但叙事伦理概念界定仍旧存在含混、理解的歧义。②当下评论界对叙事伦理的研究形成对作家、文本叙事伦理的主题归纳、叙事伦理话语形式，及基于理论知识体系的梳理，旨在中国的叙事研究的体系建构的两个方向。③叙事伦理文本批评实践，多是重“事”轻“叙”，通过形式分析而达至伦理建构一类的批评文本仅见于少数的对中国现代小说、西方经典小说的叙事分析。一方面说明西方的经典叙事学及后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当代的文论界其阐释文学现象的有效性还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似是而非的概念运用使得“叙事”与“伦理”仍旧似两张皮贴不到一块去，文本批评仍旧囿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范畴，并没有对当代文坛的小说叙事的价值问题给出方向。

“叙事伦理”主要研究路径与取得的成果梳理如下：

“叙事伦理”作为合成词，在汉语批评界最早出现在刘小枫的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在书中刘小枫从“哲学的诗化”意义上将伦理学分成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理性伦理学从属于道德哲学范畴。刘小枫这样界定“叙事伦理学”概念：“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供关于生命的感觉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①可见，叙事伦理概念出现之初，就意指明确，将文学视为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发现、反思和伦理诉求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既然确信文学叙事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对小说的批评就是阅读、发现和评论对象看待世界的方式。谢有顺以刘小枫所界定的“叙事伦理学”内涵来解读当代作家文本的伦理价值意义的主要论文有《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及《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谢有顺的《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梳理这个问题：其一，小说的创作本质即是语言的建构，离开语言、故事、叙事建构的一系列规则，其阅读就只能始于故事止于故事，而批评者也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和阐释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的种种变革和实验。同时，“文学研究中的身份危机是可以通过发展独特的专门知识来解决的，这一专门知识应该能使批评家提高描述文本本身的能力，而无需参照历史语境或哲学思想”^②。“一个批评家若要进行20世纪叙事文学的研究，掌握叙事学的知识和方法就成了必要的工作；同理，一个作家要想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也必须找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观察方式和叙事方式。”^③借此谢有顺重申当代叙事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有效的批评方法。其二，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像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一些作家创作体现出的“通而为一的生命世界”“写出‘灵魂的深’”等等属于中国文学叙事伦理资源。尤其在当下，消费主义力量侵入文学，使得文学与商业利益捆绑而改变了它既有的叙事方向，上述

①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第2、108页，《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③ [英]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第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家所具有的超越性的“伟大传统”，“对于我们认识一种健全的中国文学，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①。伍茂国的《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是目前国内对叙事伦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该著作在基础理论与批评应用两个层面，大量引入国外关于叙事伦理研究的最新观点，论证叙事如何走向伦理的知识的合法性。“在西方，‘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是伴随着各种应用伦理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探究如何有效地运用叙事达成必要的伦理效果。”^②该著作认为：现代小说的叙事伦理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小说的故事伦理；其二是小说的叙事伦理。这里的故事伦理和叙事伦理，前者指向故事的主题伦理，从属于文学主题学批评的范畴；后者指叙事构建伦理，从属于叙事学批评的范畴。在实际批评语境中，这两者可以沟通，而延伸出叙事伦理的概念。该著作在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的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体系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唐伟胜《“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论文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界在“伦理转向”与“叙事转向”背景下，叙事伦理外在和内在的成因，并总结了修辞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和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此外，张文红的著作《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借助文学文本具象的父子、性爱、历史、知识分子这四维伦理关系，透析创作主体在伦理叙事纬面所秉持的叙事姿态、文化立场、道德价值判断、艺术观念和美学风格等叙事向度。曲春景、耿占春的《叙事与价值》（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当代小说叙事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归纳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几种范式，由范式归纳而构建当代审美诗学，指出当代文学的价值失范及价值重建的可能性。刘建军的《当代语境下伦理批评内涵的重新阐释》（《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聂珍钊的《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分别从伦理概念的迁移及文学的伦理批评两个方面，指出传统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的前景。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以伦理—政治为立论基础的文化、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人文研究中伦理的转向，伦理—叙事融汇形成新的批评体系。叙

① 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第2、108页，《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②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第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事伦理研究大致分三大类:

1. 传统人文修辞伦理学,认为叙事可以直接影响、重新塑造读者的情感、自我和生活观念,发展其道德意识。如诺斯鲍姆的责任说;W. C. 布斯的“书即友”,布斯认为,文学修辞学不仅仅是关于文学技巧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经布斯的界定,文学修辞学奠定了自身发展的哲学根基(《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版);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申丹译,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亚当·桑查瑞·纽顿《叙事伦理》的“作为伦理的叙事”(转引自伍茂国《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马克·柯里的《后现代性叙事理论》(申丹译,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等。修辞伦理模式注重研究文本自身形式与伦理意味、取向的关联。

2. 解构主义伦理与他者伦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强调他者、自我和世界的陌生,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保罗·德曼对传统“语法”与“修辞”关系的质疑,直指西方形而上学根基的虚幻性,强调文学意义的不可“还原性”,意义总是被“延异”或者说意义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希利斯·米勒的“修辞性阅读”,认为批评本身即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承担伦理建构的责任。

3. 政治伦理批评。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结合,试图将传统人文伦理置换为新的价值观,如女性主义伦理(苏珊·S. 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后殖民伦理等,运用解构式阅读方式,发掘元话语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揭示文学艺术如何遮蔽历史而彰显另类的历史,尤其是创伤性的历史,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①。

二、叙事伦理及伦理叙事

小说叙事伦理研究成立的前提是,认为语言可以传达意义感,作者有责任架构一种伦理的观念,由叙事文本传达出道德的意涵;而读者阅读接受即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小说可以直接影响并塑造读者的情感、自我形象和生活观,发展其道德意识,帮助人理解“怎样度过一个善的人生”,提

^① 唐伟胜:《伦理转向与修辞性的叙事伦理》,《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高其道德的责任感。这种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就预示了文学的叙事伦理批评，在其实践过程中，包含着两种概念及取向：其一，由叙事构建伦理。后经典叙事理论为叙事伦理批评提供了叙事形式分析视角、技巧及方法。从这个方向去看，叙事伦理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文艺理论体系在文学批评实践上成功的案例（所论及的问题在第一部分讨论）。其二，伦理叙事批评。伦理叙事批评主张文学叙事要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意识，文学的阅读和批评意在发现叙事的伦理意图，应用文学批评的释义和阐释的功能（释义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析解读文本的意义；阐释是指在本文的基础上发掘、引申其意义）使得其义自现。W. C.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核心的立论，即是“作家创造他的读者”。——“我们都希望，小说家以某种方式在我们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情的水平上来写作，即一种就定义来说绝对不属于偏见的热情。”^① 在布斯的小説修辞学论述语境中，伦理叙事与伦理修辞词义同类。他认为，作家的“介入”不可避免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小说的阅读情境基于一种基本的要求：“读者们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知道作家要他站在哪里。”^② 在其后的《反讽修辞学》（1974年）、《批评的理解：多元的力量与局限》（1979年）及《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的伦理学》（1988年）中布斯进一步对“伦理”一词重新界定，同时将文本、语境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为伦理叙事批评的要素来讨论。所谓的“伦理（ethics）一词的前身是西方古典修辞理论中的‘威’或者‘修辞人格’（ethos）”，“从古希腊到当下‘威’的大意是‘人格’或‘习惯性特征的组合’，也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所赖以坚持的东西”^②。当作家要将文学虚拟世界的价值施与读者之时，他是要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的权威影响和塑造他的读者的。布斯的小説修辞理论强调，叙事的伦理导向在于作家对叙事的“控制”，也即是修辞的伦理意义。那么如何能达至有效地“控制”？布斯发展了作者“第二自我”（second self）的概念，也就是“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以及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该讲述的评价和报道都

① [美] 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美] 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没有得到隐含作者的支持)的概念^①。——所有的作者直接叙述也好,间接言说也罢,都是以隐含的形式登场,作为处于一切小说体验之中心的“读者的对话伙伴”^②。作者的隐含作者的“介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叙事文本中的“议论”是常见的修辞手段。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还把布洛的“审美距离”引入小说的分析,将小说文本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构成的不同层面的对话关系视为叙事分析的重要元素。“审美距离”一词涵盖了小说叙述关于人物、时间、情节、伦理等丰富的信息及形式要素,是布斯修辞学理论重要的贡献。

从上述梳理大致可以判断,首先,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伦理概念的甄别、重新阐释定位而衍生的批评范式(叙事伦理的“伦理”一词,在后面的论述中涉及)。在布斯的伦理批评语境中,“伦理”一词首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人格或人或自我产生效果的整个领域”,而传统伦理指向有限的道德标准:诚实、体面或者忍耐,这些只是伦理道德内涵中的一小部分。其次,传统伦理批评,要么价值导向模糊,要么结论固定单一;伦理叙事批评的“伦理必须覆盖作者和读者的修辞人格的所有品质,无论这些品质是好是坏。……伦理批评试图描述叙事者和读者或者听众之间的人格遭遇。……一个完全负责的伦理批评会清楚地表明这些评估。无论读者或者听众何时汇报关于行动中的人的故事,这些批评评估都暗含其中”^③。再次,伦理批评对读者产生怎样的效果,是布斯特别关注的,因为之前的伦理批评“唯一的责任在于将一个特定的叙事或者一种叙事贴上有害的或者有益的标签而经常将这个文类,如,‘小说’归入谴责的范畴”^④。尽管叙事伦理和伦理叙事的“伦理”内涵,因立论的语境不同,存在着意义辨析的差异性,但究其产生的背景,伦理原则、伦理规律已退去康德式的生命的道德绝对命令,而是内存于个体生命需要的一种内在的秩序、一种逻辑的自然流露和本然体现。叙事伦理批评的“叙事学”

① 转引自王建峰:《布斯的伦理修辞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第66、67-68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 [美] W. C. 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第7-8、272页,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转引自王建峰:《布斯的伦理修辞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第66、67-68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④ 转引自王建峰:《布斯的伦理修辞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第66、67-68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元素源自于西方新经典叙事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等），并且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兴的文化批评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所以说，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批评并无本质的区别，都试图用叙事学的批评方法和技巧，发掘和构架小说文本伦理的意涵。而且，其分析文本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并非经典叙事学的纯技术型的，乃是叙事学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与历史主义的结合的产物。

三、所述内容及相关的理论阐释

叙事伦理概念的溯源，即对叙事走向伦理知识的合法性的梳理：

1. 人类“伦理”概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激烈变迁而呈现不定的意义内涵：血缘、信仰、理性形成的互有差性的伦理道德观念，及至全球化时代新型的伦理观念——“个人的权利”。由此，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个由本体论、认识论到分析伦理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伦理学渐进地走出理性主义桎梏回归生活领域，思与诗对话架构起新的“生命关怀”的伦理观。中国从先秦到宋、明历代，儒家思想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统一。而且，传统的伦理学起源于感性直觉主义，伦理道德是人自我内心固有的向善至善的性情自然流露。

2. “叙事学”知识背景。基于文学真、善、美三性而形成的文学批评元叙事句法，可称之为理性句法、审美句法、伦理句法。伦理句法正是在理性句法、审美句法此起彼伏中，逐渐被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文论“伦理转向”及随之而起的“叙事转向”，伦理—叙事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批评体系。之后，西方新经典叙事学（包括解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共同突破了形式主义研究的拘囿，打通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分析的壁垒，这些为中国的叙事伦理批评提供了可参照和借鉴的新的理念和方法。

3. 叙事伦理与西方新经典叙事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等）、文化批评，及传统文学伦理批评都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对叙事伦理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当代文学理论界倡导的“西方文论中国化论”的文论工作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来的叙事/批评伦理观念、方法的研究和借鉴，搭建起我们自己的关于小说叙事伦理批评的平台。但特殊文化语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小说伦理的非普泛性，我

们研究的任务及实际意义在于,通过对叙事的批评实践来建构文学的伦理意义。

叙事伦理与中国当代小说话语范型的迁移,及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话题之间的关系问题:

1. 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是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伦理”(20世纪50、70年代)、“精伦理”(80年代以来)的叙事模式比较中显身的。按照“现代化”的历时性发展,当代文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形成,是从政治伦理、精伦理再到个体伦理的衍变:政治伦理规约下的文学意义的传达;精伦理指向性的文学启蒙现代性叙事;归回情感、欲望、个体的小说的叙事伦理。由此,建立起生活叙事和个人叙事伦理纬度,形成内涵各异的小说话语范式。

2. 在叙事伦理视阈下,当代小说创作中相对集中的诸如,历史、苦难、身体、罪性、性爱,以及女性的叙事话语等,因文化背景、叙事观念的变化,在叙事立场、视角、结构等方面呈现伦理价值意义的游移与延异。比如,“历史创伤”“个体苦难”等,启蒙叙事着重表达其历史的本质,叙事承载着人性启蒙及社会批判性的意义;先锋叙事强烈的乌托邦欲求与人性原罪设定的两极叙述,使得苦难表述缺乏现实的、个人存在的根基,而常常陷入语言的迷津;而在当下的小说文本中,比如,鬼子、东西等作家,写实性的苦难叙述,颠覆、消解了苦难的本质设定,却在叙事伦理的层面打开了直抵苦难根底,“创伤”“苦难”与爱欲、人性的偏执、荒谬相勾连,叙事从人“已然”的现实出发而抱慰人性的苦难。而另一类写作则将苦难处理成生活的表意符号,苦难的本质趋向虚无化。

3. 小说的叙事伦理渐进地将文学从宏大叙事中“位移”,重新修复了文学与生活的亲缘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安忆的《长恨歌》、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推拿》、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铁凝的《笨花》、须一瓜的《太阳黑子》等小说相继问世,评论界已经很难为这些小说归类命名,它们题材各异,话语方式有别,但那份自在的、松紧有序的表达方式,弥漫着文化生活的气息是共同的。这表明文学在不断地被边缘化、市场化的同时,文学创作对外部环境(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动向、历史变迁等等)的关注和屈从,将会随着文学自律意识的复苏而逐渐消除,文学将重新疏通整理自身的叙事经纬,构建自己的叙事伦理维度。

多重伦理与伦理底线设定并存的批评原则问题、叙事伦理的批评方法

和路径问题、小说叙事研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些问题是本书集中论述的话题。此外，上述所关注的话题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叙事的个案阐释，构成本书的主体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及个人的创伤、个人的边缘境遇、个人的性情及欲望的叙事伦理问题，试图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共性的叙事文本，析理出它们在叙事表达上显示的伦理趋向。在商业化社会，文学的边缘化处境不可避免造成道德伦理价值立场的空缺，如果将伦理价值的问题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文学写作的实践过程之中，那么它就会显现为一种个体的意向性的行为，它们传达出的价值即便难以成为大众普遍性认可的观念，但其本身因储存着当代人对历史现实真切的经验、觉知及反思而别具意义。这种融合着个人的心性情怀的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给出了体认和呈现，并能够在相对独立于社会政治学的知识性体系中得到阐释，同时这些成功叙事案例为其阐释的框架提供理论架构的支撑。我们说，文学的担当和“介入”精神，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化行为，作家们的个人的社会存在、个人的写作精神应当被承认和关照。于社会文化自由交往的语境中，源自个人的有价值的叙事，它自身的意义就会一再地增值，犹如涓涓溪水流向远方，所到之处既滋润着万物花朵，也在其间不断地获取滋养，而后汇入大江大海，在净化融合中完善自身。

第一部分 叙事伦理与批评方法

一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是有方向、有规范的。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方向被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说成是，民族国家形象的隐喻性表达。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借助语言与形式极端化的文本实验，力图打破这样的叙事惯性，扭转汉语写作的方向，由此导致对固有的叙事模式、阅读习惯、批评范式的颠覆。先锋小说的文学实践大大拓展了文学叙事的场域和写作的边界。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理论的译介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坛叙事的转向。而到了 90 年代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被直接拖入了市场运作机制并再次改变了它的叙事轨迹，一方面文学的叙事被分解为新闻写作报道之类的事件，为大众提供饭后茶余的助兴消遣；另一方面叙事满足了大众听故事的愿望，而凭借网络空间，玄幻、穿越、悬疑及惊悚等等将故事的虚拟性极致发挥，打造出了一场丰盛的文字游戏的盛宴。于此，作为叙事艺术产物的小说，其写作的难度在降低，叙事探索更是难以为继。

鉴于上述现象，我们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将通过叙事伦理概念的梳理，析理并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艺术的探索的方向；对叙事伦理概念进行溯源，及厘清它与西方新经典叙事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等）、文化批评，及传统文学伦理批评存在的深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当代文学理论界倡导的“西方文论中国化论”的文论工作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来的叙事/批评伦理观念、方法的研究和借鉴，搭建起我们自己的关于小说叙事伦理批评的平台。

一、叙事伦理：小说叙事研究的现代形态

本论题所论及的叙事伦理不是“叙事”“伦理”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叙事学与伦理学理论体系两相拼和而衍生的批评术语，而是具有自足内涵的理论概念。叙事伦理偏向小说艺术理论范畴，强调从“个人”立场出发，将历史文化语境与小说叙事学研究结合，对小说存在的意义及价值重新定位与探讨。对“叙事伦理”这一文学批评概念进一步的梳理，必然涉及这样几个问题，“叙事伦理”与传统的伦理学批评方法其内涵的交汇及歧义点在哪里？叙事与伦理在现代小说叙事研究中能否统一，其统一的基点在哪里？“叙事伦理”概念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衍生出怎样的意义内涵？

（一）理性句法：文艺批评语法基础溯源

就一般意义而言，伦理和道德常常被视为近义词或同义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里则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了大体的区分：伦理被界定为自然意义上诸多的关系，而道德则是从诸多伦理关系上人为建立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内在约束性的信念规范，具本体论意义。人类所创造的文学艺术形式里原本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小说的叙事其实就是一个伦理事件。人类小至个体大至群体、集团，互生性地形成一种圈状性的伦理关系图式。也就是说，人的在世根基性存在是家族血缘伦理，然后随着生活社会圈的扩大，形成各种各样宗族的、宗教的、社会性的、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另一方面，由社会生产力进步带动的人类历史的更迭，必然的是以对人伦关系的冲击、改变，乃至引发人伦关系的异化为前提。人文学科因为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研究的范畴，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对历史史实的整理归纳，为历史提供一份事实存在，给人类的情感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明；哲学家起于对万物的惊异而激发反思与形而上的眷注，借逻辑思辨的力量，力图为人类解释已经发生的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宗教学家以玄思、超脱的话语方式，可以给人类的情感以抚慰，引导人类走出深渊而诱发自我救赎的愿望；只有文学可以凭借虚构与想象的力量，重新叙述一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故事，让失落的心灵、受伤的情感获得一个纯精神的家园。文学的叙事既可以复原一个民族历史